

在探索和回答实际问题中实现理论创新

吕政

章,而是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经济规律。

我在工业经济理论研究上有所收获,是与1970年以来坚持深入实际和理论联系实际分不开的。老所长、著名经济学家马洪曾提到,工经所的研究方法是从问题出发,研究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党和政府的经济决策服务。研究人员必须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坚持调查研究。所以到工经所从事研究工作以后的40多年,我始终以老一代学者为榜样,坚持从问题出发,坚持深入实际,不间断地到工矿企业和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参与中央各经济主管部门的政策咨询工作。由于我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直接得到工业企业发展、改革和运行的第一手材料,既加深了对实际情况的感性认识,更为理论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在探索和回答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备创新精神,时刻准备创新,不能成为一名做重复性劳动的“匠人”。

我到工经所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马洪同志主持的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发展问题研究。我承担了总结1979年开始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提出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任务。根据对我国产业结构历史沿革问题的研究,我从理论上揭示了产业结构的内涵,即它是由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是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的支配。其作用主要是制约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决定着产品的市场供求;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效率,关系到国家及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和影响着贸易条件、进出口结构和效益。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则具有刚性。结构调整将会影响资产存量比例关系的变动,因此既要解决生产力的物与物的关系,还要解决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参与我国军事工业调整与改革问题研究,后来担任国防科技工业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1991年秋季,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次战争的形态与传统战争完全不同,进攻方海空一体化、战机隐形化、超视距、精确打击,零接触、低伤亡。海湾战争的模式不仅震惊世界,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化战争的战略与策略,认识到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思考军队建设和国防科技工业如何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战争要求。我在参与国防科技政策研究过程中,在与军工专家切磋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政策的主张,即实行“需求导向、创新引领、工程依托、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社会化分工”的方针。

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提高工业竞争

力,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重大课题。2001年初,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我们工经所研究这个问题。我对世界工厂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界定了世界工厂的内涵。我认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是该国的工业有一系列重要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位居前列,有一大批工业企业成为世界制造业领域的排头兵,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发展趋势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既要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同时也要不失时机地推进产业升级,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改善贸易条件。

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的改革,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行业为主导的工业管理部门如煤炭部、石油部、机械部等陆续撤销,这些部门下属的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但同时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即国有企业没有出资人代表,而且出现“五龙治水”的局面,即国家计委管企业投资、经贸委管企业运行、财政部管企业核算、外贸部管企业进出口、大企业工委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我于2002年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份报告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此后,我参与了国务院国资委的设置及其职能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国资委的成立和运行,克服了“五龙治水”的弊端,明确了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主体,防止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推动了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和发展。

正是依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工经所的研究人员既懂得运用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又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让工经所在国内外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和声誉。

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当前,我国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中国式现代化还面临着不少难题。如何使我国经济发展得又好又快,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经济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使命。

从2004年开始,我的研究重点转向科技创新问题,并参与了新世纪我国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国产化研究、高性能纤维研发与制造能力研究等项目。通过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我对科技创新的规律和组织方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认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科技创新分为发现、发明和科技成果转化三个阶段。发现的目的在于揭示从宏观到微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及其运动规律,主要是从事基础理论

思想人生⑬

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来自于实践。与此同时,追求理论创新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天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要求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每做一个研究课题,每写一篇文章,都必须研究和回答新问题。

调研为理论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可靠的实践基础

我大学读的是政治教育系,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后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68年9月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和军训。1970年2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从事军需工业生产技术研究新调查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在总后勤部工作的8年多时间里,常年到全国各地的军需工业企业、各军兵种所属企业和“三线”军工建设工地进行调查研究,获得了工业经济、企业管理以及国防科技工业方面的实践知识,这为后来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和从事工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1981年9月我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工经所)工作。我的研究方向是应用经济和企业管理,这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研究领域。专业特点决定了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熟悉实际情况,具有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系统的专业训练是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仅仅从书本上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出了校门就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缺乏做实际经济工作的阅历和经验,其知识结构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有缺陷的。不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没有在中国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经验,就难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经济学家。

我可以分享实际调研中的两个例子。比如,我去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发现海螺水泥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厂房附近,也存在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其他水泥厂。通过观察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立刻思考:为什么国内先进产能不能淘汰落后产能?再比如,我去日本访学时,发现日本的成田机场有一些专门负责接送旅客的接人公司,旅客统一在他们的引导下去往各自的目的地。而相比之下,我国的机场和火车站却没有这样的专业化接待机构,都是个人或者团体分别接送,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而且还造成了机场和火车站的拥堵。这个小小的案例,足以反映出中国的社会机制建设还存在提升空间。所以说,多实践和多观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知世界。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论文和研究报告要做到有的放矢,没有从书本到书本的空洞说教,做出来的不是表面文

终身学习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必由之路

张建国

实现终身教育丰富便捷,满足人民群众时时处处学习的需要。对此,浙江开放大学以综合改革为契机,重塑覆盖全省的省市县街镇四级教育服务体系,系统集成学历教育、非学历培训与社区教育供给体系,打造集聚联动优质资源、沟通衔接各级各类教育的机制平台,开发全方位、立体化的在线学习环境,建设了学历教育“在浙学”应用系统、非学历教育“浙学通”应用系统,为社会各群体全生命周期创造多元学习空间,满足不同文化层次、年龄阶段和不同职业的多样化学习需求。最后通过“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场景互通和学习成果认证转换,从而构建起“在浙学”“浙学通”“终身教育学分银行”三大场景融通的全民终身学习大体系。

完善的终身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是个体终身学习的助推器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系列重要论述,建设衔接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尤其是推动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证与转换,对个体通过此类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技能进行官方认证,有助于持续激发个体终身学习的强烈意愿,促进个体持续提升自我素质,推动社会劳动生产力持续攀升提质,实现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一方面,学习成果认证

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动个体的终身学习与发展,使个体一生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得到认可,提升劳动力的社会生产力。同时,证书、学分等又能成为个体自身发展的重要资源符号,从而实现个体已有资源以及潜在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认可及有效转化。另一方面,正规教育一般仅允许特定的对象接受学历教育或教育,限定了学习者的范围,但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为更广泛的群体开展学习提供了便利,拓展了人力资源开发的范畴与外延,相应的学习成果转换与认证也帮助不同层次、类型的学习者获得社会资源利用的机会。此外,其也助益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变革与调试,使人力资源开发的要素、过程与模式更具韧性、弹性与灵活性。

对此,浙江开放大学先后开展了学习成果认证、非学历教育课程认证,为不同层次学历与非学历课程的转换提供依据;与浙江省多所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对接,推动高校在线开放课程的跨校学分互认转换;推进个人可信数字学习档案建设,接入学信网、人社部等各类证书200余种,实现与上海学习成果数据的互联互通,建成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经省厅电子签章的可追溯、可核查、不可篡改的学习成果证明开具功能;建成基于一屏三端的学习成果存储、认定、转换、应用一站式管理平台。目前,已为1700万学习者建档开户,存入各类学习成果信息8800余万条。

之江智库

浙江日报·理论周刊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推进智慧农业发展”。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智驱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数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浙江探索与经验

近年来,浙江全力推进数字化改革,打造数字政府的“浙里乡村”重点应用跑道,实施“强村富民”重大改革项目,涌现出了嘉兴“种粮宝”、黄岩“瓜农天下”、仙居“农农在线”、安吉“白茶在线”、龙泉“益林富农”等一批管用好用的应用场景,让广大农民感受到数字化改革的红利,为数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先行探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经验。

一是技术支撑、数据赋能。充分运用传感器、物联网、区块链、AI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实现多维多源数据的收集、连通、共享和创新应用,以数据流改造农业业务流,以数据链打通农业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和政策链,解决农业发展中传统方法解决不了的痛点。二是政府引导、多主体参与。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农业数字化改革之中,构建多主体共建共享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三是模式创新、全面集成改革。从数字技术应用,到数据赋能农业预测、生产、组织、运营、销售、金融服务等全流程业务重组,再到农业制度重塑和组织变革,逐步实现农业多领域和全方位的集成改革效应。一个个农业数据应用孤岛被连接起来,形成集群应用生态,进一步促进农业效率提升,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形成。

数智驱动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及对策

一是对应用需求的研判还不够准确。许多农业数字化需求分析往往从主管部门、开发者、自有数据视角出发,缺乏对农民、农业发展整体性、数据关联性的分析,需求研判不精准,应用可拓展性不强,缺乏可持续或普及推广意义。应紧抓农民这一主体,全面深入调研和发掘农业改革与发展中的普遍需求和痛点。需求研判上接国家战略与政策,体现前瞻性和引领性;中接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与特点,体现地方性和特色性;下接解决农民农业具体问题的实用性和价值性。

二是可供开发利用的数据还不够充分。数据独占和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导致可供利用的数据数量和类型不够丰富,特别是多源多维的外部数据缺乏,制约了农业发展中的数据集约协同创新。应加快推进各类涉农数据共享和开放,为农业数字化提供充足的“原料”。要着力加快政府不同部门涉农数据的统一归集与共享、向下回流及向社会开放;鼓励大型平台企业推进涉农相关数据目录梳理、数据共享及历史数据向社会开放;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提升全社会数据需求和增加数据高质量供给。

三是利用数据新能力的还不够强大。新兴与智能技术应用,业务、数据与场景模型等开发能力不足,监管、业务、数据、技术人员协同不够,缺乏复合型数字人才。应加大相关人员在农业发展战略与政策、农业数字化发展动态和典型实践、前沿数字技术与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力度;优化高校相关专业设置,鼓励跨专业交叉研究,培养懂农业、数据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搭建促进农业数据创新和数字化发展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四是支撑农业现代化的数字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农业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影响了农业数据的形成、采集、开发、应用与创新,阻碍了农业数字化转型。应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鼓励引导企业投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农业发展提供规模化、集约化、普惠性的数字平台和数据服务;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和使用数字基础设施的能力。

五是数智化农业生态体系有待健全。农业数字化转型总体上呈现自发性、局部性、重复性、碎片化等特点,缺乏统一规划和组织。应从外部打造全社会协同推进数智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包括推动建立农业数据空间、农业数字应用市场、农业数字化发展联盟等;从内部重点挖掘数据在创造农业新价值、构建新型农业协作模式、打造更丰富体验、实现更有效决策等方面的潜能,构建全流程覆盖、智能化的农业数字创新应用体系。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委党校】

对策研究

强化基层系统集成改革保障

李玲 林艳琴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推动广大基层农村以系统观念和集成理念探索改革措施,强力打通改革堵点难点,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聚焦政策与措施集成

一是实行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和政策体系,形成整体推进格局。浙江探索出“市场化改革+集体经济”“标准地改革+农业“双强”“宅基地改革+乡村建设”“数字化改革+强村富民”四套组合拳,激活了乡村共富动能,实现了工作成效叠加。二是串珠成链系统重塑,形成联动、融合、闭环的改革链条和矩阵。新时代基层系统集成改革要增强有关改革之间的衔接配套,打破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合作壁垒,打造改革集成链条。三是构建数字化政策集成创新平台,推出一批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需要的政策。四是分类推进,培育特色产业。作为常山县唯一强村富民集成改革试点乡镇,新昌乡立足乡情实际,引导各村因地制宜发展月季、茭白、丝瓜络、光伏、全域旅游等特色产业,打造“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品多产”,注重打造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乡村新产品品牌。

促进功能与平台集成

一是数字赋能强村富民,迭代升级数字化应用。优化“浙农经营”应用,推动技术升级和层级贯通;迭代建设“浙农富裕”应用,聚焦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加

快推进“浙农富裕”应用架构重塑,不断完善“农房盘活”“灵活就业”“农业保险”“浙农帮扶”等应用,加快建立省市县贯通的帮农促富治理和服务体系。二是搭建强村富民公司平台,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新昌乡成立了由浙能集团、农投集团和10个行政村三方出资的常山县富好生态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借助山海协作、结对帮扶,合资建光伏、联手种丝瓜、聚力代加工、抱团搞经营,促进千人就业,带动万人增收。三是建设一体融合金融创新平台,推动渠道和服务下沉。搭建集银企对接、企业征信服务、股权融资服务和大数据风险监测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三农”信用数据交换平台之间的合作。

推进资源与力量集成

一是强基赋能,缔造系统集成改革“压舱石”。以“两进两回”“乡贤治村”“导师帮带”等推进共同富裕,形成建立共同富裕人才库,带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激发乡村活力。二是深化联营抱团,集聚系统集成改革“动力源”。通过开展优质农产品销售、乡村体验与休闲游、农业与农村研学、村企结对帮扶等项目,创新探索“村企抱团”“村村抱团”和“村民抱团”等模式,聚集力量、链接资源、统一经营,实现多极支撑、多元发展、多方共赢。三是探索多元化富民合作机制,注入基层系统集成改革“黏合剂”。鼓励农民以资金、土地、农房等要素入股,加强村集体与农民或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发展盈利较好的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作者单位:常山县委党校】